

小说艺术形态

余昌谷 著



安徽文艺出版社

(皖)新登字04号

小说艺术形态

余昌谷 著

责任编辑：沈小兰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金寨路283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省新华书店

印刷：安徽省当涂县印刷厂

开本：787×1092 1/36

印张：6 4/9

插页：2

字数：120,000

版次：1991年11月第1版 1991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

标准书号：ISBN 7-5396-0101-9/I·93

定价：2.80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漫谈小说的节奏美	1
契机的功用及构成	9
悬念的魅力与设置	18
短篇小说的“聚焦”艺术	28
短篇小说的抒情艺术	38
短篇小说的氛围创造	47
短篇小说的色彩描写	57
在多层次的掘进中深化人物性格	68
“写出性格来”	
——金圣叹谈小说人物形象的塑造	85
“纵横曲折 经营惨淡”	
——金圣叹关于小说情节结构的美学思想	99
论张弦短篇小说的结构艺术	111
论湛容小说的结构形态	130
论鲁彦周小说结构的电影化特征	150
萧马中篇小说的理性因素	167
耐人寻味的“最后一瞥”	
——谈《乡场上》的结尾艺术	177

当今小说中的动物世界	184
当今小说象征蕴涵的美学特质	201
在改革浪潮的冲击下	
——谈阻碍改革的人物形象的塑造	217

漫谈小说的节奏美

“文武之道，一张一弛”，这句古话朴素地揭示了事物的运动规律。节奏，就是事物运动中的动与静、张与弛的交替变化与和谐统一。事物都是运动的，因而也都有节奏。波涛的时起时伏，潮水的有涨有落，地势的高低错杂，季节的春秋代序、寒暑更替，人类生活中长期的平静酝酿着短期的突变，疾雷迅雨的革命狂飚又带来相对的稳定，这些运动现象的盈虚消长、升降转化、和合分离，便构成了节奏。

事物的运动有节奏，小说对现实生活的反映同样离不开节奏。我国古代小说评点家对此就颇有见地。金圣叹在评点《水浒》时便提出了长篇小说在两个表现气氛紧张的重大冲突之间，插入一段舒缓的“天晴地朗，柳絮花拂之文”的美学见解。他十分重视情节、气氛的跌宕变化，正如“在千岩万壑、崔嵬突兀之后，必有平莽数十里，以舒其磅礴之气。”从艺术欣赏的角度看，金圣叹的这种观点也是有道理的，人们的感官欣赏色彩、音响、线条、动作的错综变化，而厌倦单调乏味的重复；节奏有

变化，起伏有层次，才能调剂读者的情绪，激起人们感情上的波澜。这好比游山，“前山未远，魂魄方收；后山又来，耳目又费”，中间有小桥、曲岸、浅水、平沙来调剂，才不败游人的意兴。因此，从真实地表现有节奏的现实生活来说，从满足人们对节奏的审美要求来说，小说对生活画面的描绘都应该动静交错、张弛相间，有鲜明的节奏。

小说离不开节奏，节奏赋予小说内容以美的形式。一位艺术理论家曾这样说过：“节奏是一件艺术品中所包含的一切不同因素之有秩序的、有节度的变化。”^① 这些变化可以说千差万别，但归结起来，无非是表现着自然物质材料（诸如声音、色彩、线条、动作等）在时间或空间上的间歇延续、停顿与重复，以及它们在高低、强弱、升降、显隐上的不同对比与组合。就长篇小说而言，在情节、场面上可能有壮美与优美的交相辉映，在气氛上可能有悲剧气氛与喜剧气氛的渗透杂揉，在描绘对象上可能既有美与丑的强烈对比，又有威武与文秀、刚强与柔媚的突然转换。这种种复杂的美学因素熔铸在长篇杰作中，便形成了节奏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壮美与优美两种场面的转换，最容易产生节奏鲜明的艺术效果。这一点，我国古典文学大师就已经注意到了，并常常在创作中表现出来。《三国演义》写刘备与孙权争夺荆州，双方斗力斗智，显示了壮美的意境，中间却忽然出现“吴国太佛寺看新郎，刘皇叔洞房续佳偶”的优美场面；刘备跃马过檀

溪，惊魂甫定，余悸未释，眼前却突然一亮，牛背放牧，笛声悠扬，掩映着茂林修竹的田园村庄；赤壁大战，“舳舻千里，旌旗蔽空”，曹操却雅兴甚浓，“酹酒临江，横槊赋诗”。这些情与景，一动一静，一张一弛，形成了起伏跌宕的节奏。毛宗冈在评点《三国演义》时曾用“鼓”和“钟”来比喻壮美的场面，用“笙箫”和“琴瑟”来比喻优美的场面，并称赞《三国演义》一书有笙箫夹鼓、琴瑟间钟之妙，善于把钟鼓的壮美和笙箫、琴瑟的优美织成节奏鲜明的乐曲。他说：“人但知《三国演义》之文是叙龙争虎斗之事，而不知为凤、为鸾、为莺、为燕，篇中有接应不暇者，令人于干戈队里时见红裙，旌旗影中常睹粉黛，殆以豪士传与美人传合为一书矣。”正因为如此，我们看《三国演义》的场面变化，时而会心惊魄悸，时而会心旷神怡，时而又如坐春风、如饮甘醇，产生出多种多样的美学感受。

描写对象突然由威武转入文秀，或由刚强转入柔媚，也会产生顿挫分明的节奏。这在我国古典小说中也是常常见到的。如《水浒》在写武松之后，接着写花荣。武松是威武的性格。这种性格，通过景阳冈打虎、醉打蒋门神、大闹飞云浦、血溅鸳鸯楼等一系列情节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刻画。而花荣的性格特点，照金圣叹的概括，是“文秀”。金圣叹是主张把威武和文秀这样两种不同性格特点的人物传连接起来的。他说：“看他写花荣文秀之极，传

武松之后，定少不得此人。”这种主张，正是总结了艺术描写对象转换的内在变化特点，从欣赏者的美感心理来说，也是符合人们对节奏感的审美要求的。威武的性格和文秀的性格给予读者的审美感受、审美趣味确实不同，把这两种不同性格的故事连接在一起，就能使读者在审美心理上有所转换，从而获得更大的美感享受。描写对象由刚强转入柔媚也是这样。《水浒》写武松打虎之后，紧接着写武松遇嫂。前一幅画面，武松面对的是咆哮狂吼的猛虎，猛虎扑来，武松不为其凶所惧。后一幅画面，武松面对的是柔情蜜意的嫂嫂，她酥胸微露，云鬓半亸，举杯向武松劝酒，要他饮过成双杯儿，但武松不为其色所迷。吃人的老虎和偷情的少妇，一个刚健雄强，一个柔媚婀娜，恰恰是对立的两极。小说的描绘对象突然为之一变，不仅正好从两个不同的侧面表现了武松的英雄性格，而且在情节的延伸发展上也产生了强烈的节奏感，从而引起了读者欣赏心理的相应改变。正如金圣叹所说：“上篇写武二遇虎，真乃山摇地撼，使人毛发倒卓。忽然接入此篇，写武二遇嫂，真又柳丝花朵，使人心魂荡漾也。”

把“悲”情包含在“喜”氛之中，以喜衬悲，喜中有悲，悲喜相照，造成一种跳动激荡的节奏，这是我国古典小说在艺术描写上的又一技法。《红楼梦》可以说是这方面的绝唱。这个长篇自始至终回转着“悲”的旋律，但又不时飘漾出“喜”的音

符。元妃省亲、可卿出殡、清虚观打醮、史太君两宴大观园、祭家祠与开夜宴，可谓极一时之盛，写得热闹极了。这些欢乐情景组成了情节发展长河中一个又一个波峰，节奏鲜明，令人触目。但透过这些欢乐景象的表面，天才作家曹雪芹又揭示了它们悲剧性的实质，即以元妃省亲来说，她“恩准”与家人会面，该是喜气洋洋的了，但这喜庆场面始终笼罩在一片悲剧气氛之中。贾母、王夫人虽然是至亲长辈，但在森严的等级制度面前，见贾妃只能施以君臣大礼，贾妃见此情景，不免“垂泪”，她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人满心皆有许多话，但说不出，只是呜咽对泣而已。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道：“当日既送我到那见不得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这时不说不笑，反倒哭个不了，一会儿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能一见！”说到这里，不禁又哽咽起来。邢夫人忙上来劝解，贾母等让贾妃归坐，彼此又不免哭泣一番。此时此景，喜乎？还是悲乎？脂砚斋曾指出《红楼梦》有“偏于极热闹处写大不得意之文”的特点。的确，曹雪芹从没有孤立地写过“喜”，也没有孤立地写过“悲”，而是把“悲”和“喜”联系起来挥写，喜中写悲，以喜衬悲，从而使得“悲”因“喜”而益悲，给人一种突兀奇特的印象，而顿挫分明的节奏也就产生于这突兀奇特的跳跃激荡之中。

小说的节奏还具有多种多样的表现形态。今

天，随着时代的发展，现代工业社会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了，人们的思维节奏也相应地加快了。他们不但能接受蒙太奇，而且习惯于声画分立和意识流等现代表现手法，这就使得反映现代生活的一些小说在节奏上具有较快的跳跃式的特点，更呈现出复杂多变的表现形态。如茹志鹃的《剪辑错了的故事》，画面穿插交错，时序颠来倒去，令人眼花缭乱。时而淮海战役前后的农村，时而大跃进年月的农村；时而是老寿目送子弟兵的眼泪，时而浮夸风又引起了她沉重的叹息；时而老甘命令一夜之间伐尽梨园，时而老寿一连撂倒了五棵心爱的枣树，老甘含泪从身后抱住了他……，这真叫人怀疑，作者是否在“变戏法”呢？的确，作者是在“变戏法”。据说，茹志鹃在生活中曾听人感叹道：“如今的革命，真有点象是变戏法。”一句话触动了她的生活体验，她于是想到了从解放前夕到大跃进年代的人事沧桑，吟咏出极左路线如何把干群关系一步步推向了对立的地步。这当中包含着多么沉痛的教训，象老寿和老甘这样的人物又经历怎样曲折的思想历程呵！可是，如此曲折的生活，如此变化多端的人事，该采取什么样的情节结构方式来表现呢？作者终于从“变戏法”找到了契机，大胆采用了电影蒙太奇的手法，以跳跃的节奏，互相独立的情节断片，组成作品，从而给内容找到了最合身的形式。

小说的节奏是变化多样的，但又不是无规律可

寻的。“张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弗为也。”^③无论什么事物的运动都会采取两种状态，即“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和显著地变动的状态。”^③所谓“张”，就是“显著地变动的状态”；所谓“弛”，就是“相对地静止的状态”。动静交错、张弛相间的艺术辩证法作为生活矛盾运动的艺术反映，当然要受到这种运动规律的制约，符合这种规律性。因此，小说的节奏也就要因自然之波澜为波澜，切不可为起伏而起伏，为节奏而节奏。正如张笃庆所说的，“起伏顿挫，亦有自然之节奏在”^④。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指出：“控引情理，送迎际会，譬舞容回环，而有缀兆之位，歌声靡曼，而有抗坠之节。”意思是说，艺术中的节奏，或纵或收，或开或阖，都要加以控驭。好比跳舞，无论如何回旋，都要保持一定的行列和位置，又如唱歌，那摇曳的歌声忽高忽低，都要按照固定的节拍。这些说法，都体现了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小说的节奏问题，归结起来，实际上就是一个辩证地处理动与静、张与弛、开与阖、庄与谐、悲与喜等对立统一的关系问题。列宁在《哲学笔记》中摘引过黑格尔的一句话：“差别是谐和的本质。”这对于节奏也如此。没有差别就不可能有和谐；同样，没有差别也不可能有节奏。但这种差别又是应当使它们能够成为统一的。差别的统一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艺术的节奏就产生于这矛盾的对立统一之中。有经验的小说家正是掌握了这一规律，把有差

别的两种事物组织起来，加以对比映衬，使之统一为和谐的艺术整体，在揭示差别和矛盾的本质中来形成鲜明的艺术节奏，以表现形象的特定意蕴。鲁迅在《阿Q正传》中写阿Q被处决前画押的情景，该是多么令人心酸悲愤呵！然而，正是这位阿Q，却“使尽了平生的力画圆圈，他生怕被人笑话，立志要画得圆。”当圆圈画成“瓜子模样”时，他感到十分“羞愧”，认为这是他“行状”上的一个污点，但不多时又释然了：“孙子才画得很圆的圆圈呢。”出现在悲剧情景中的这种行为和心理，是带有某种喜剧性的，两者表面上显然很不协调，它既可悲，又可笑；然而，和谐的艺术节奏却正从这里产生。鲁迅写阿Q的可笑，正是为了更深刻地揭示其性格的悲剧因素，因而这种令人惨然的可笑不过是悲剧基调的深刻变奏而已。鲁迅的小说常常就是这样地将喜和悲、笑和泪交织在一起，组成一幕带有喜剧性的大悲剧，充分显示出和谐的艺术节奏。

哲人康德说：艺术创作是没有规律的合规律性。我们这里所谈的小说的节奏也是这样。它一方面是复杂多变的，另一方面又是有规律可寻的。“无穷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让我们不倦地探索和发现吧！

①《演技六讲》。

②《礼记·杂记下》。

③《矛盾论》。

④《师友诗传录》。

契机的功用及构成

一个作家，从生活中选取了题材，确立了主题思想之后，为了把作品的思想内容更充分、更突出地从情节的发展中表现出来，就需要对人物、事件、场景等创作材料进行全局性的精心铺排，以组成戏剧性的矛盾冲突。而在这中间，契机的构思和运用是很重要的一环。契机，就象化学反应中的催化剂一样，能使矛盾突发，出现新的局面，从而有助于作品主题思想的表达和人物性格的深化。

契机有时点明某种突变，造成事态发展的起因。如大家所知，抄检大观园是《红楼梦》中的重大事件，它相当集中地反映了贾府主子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矛盾关系。对于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事件，才能平庸的作者肯定是会棘手搔头，无处下笔的。但曹雪芹却出人意外地设置了这样一个契机：傻大姐误拾绣春囊，由此引发出这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傻大姐拾着绣春囊，这是偶然的。在大观园里，略懂点事的丫头拾到它不是赶紧扔掉，便会偷偷藏起来，唯独她“左右猜解不开，正要拿去给贾母看呢，所以笑嘻嘻走回”。没想到迎头碰见邢夫

人，她便笑着递上去。谁知邢夫人把这个“爱巴物儿”封了打发人送给王夫人，寻她管家不严的短儿，把王夫人“气了个半死”。王夫人找到王熙凤，二人便拟以“查赌为由”抄检大观园。于是把个大观园闹得鸡飞蛋打，一片混乱。结果，司棋、晴雯横遭惨死，芳官等被赶入尼姑庵。一点火星导致如此大动干戈，说明贾府正面临着各种危机而又极力挣扎。这是偶然中的必然。偶然和必然，是事物发展过程中的两个不同形态，必然性寓于偶然性之中，而又通过偶然性表现出来。曹雪芹在创作中是体现了这一辩证法的。在抄检大观园之前，小说便通过日常生活琐事和若干小事件的描述，反映了贾府的各种矛盾和这些矛盾一触即发的趋势。但那还只是象一江春水，风送涟漪，前后推进；到绣春囊出现，则象暴风骤雨，夏水襄陵，顿时一片惊涛骇浪。可见，傻大姐误拾绣春囊，事虽偶然，但作为促使事态发展的契机，艺术作用却大得惊人。

契机有时构成某种纠缠，成为情节发展链条中的环扣。《阿Q正传》中阿Q与小尼姑的路遇，从情节发展上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契机；这一契机甚至可以说是促使阿Q的命运急转直下的一个转折。对阿Q性格发展有特殊意义的“恋爱悲剧”就是由此而引起的。阿Q是在受了假洋鬼子的棒打以后，将到酒店门口时，碰到静修庵里的小尼姑的。便在平时，阿Q看见伊也一定要骂的，而何况此时是在屈辱之后呢！你看他走上前去大声地吐了一口

唾沫，“咳，呸！”接着去摸小尼姑新剃的头皮，呆笑着说：“秃儿，快回去，和尚等着你……”。当小尼姑抗议时，阿Q又说：“和尚动得，我动不得！”于是他索性又拧了一下小尼姑的面颊，招了她一句痛骂：“这断子绝孙的阿Q！”然而，正是在摸了小尼姑的头皮，拧了她的面颊和被她骂了“断子绝孙”以后，阿Q才产生了不“断子绝孙”的念头和对恋爱的要求，以致于酿成了后来的“恋爱悲剧”，被赶出赵家，未庄的人不再找他做活，从此也就发生了“生计问题”，最后不得不进城，干起了偷盗的勾当，直至被枪毙。鲁迅正是通过阿Q与小尼姑的偶然路遇作契机，进一步发展了阿Q的思想性格和他的必然命运。一次平常的路遇，因为它有利于表现人物的性格和情节的发展，在作品中竟然引起这样的连锁反应和产生如此巨大的作用，这就说明了契机在情节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契机有时启开人物的心扉，成为人物思想转变的枢纽。如何写好人物的思想转变，是文学创作中经常遇到的一个问题，也是使作家们感到难以处理的一个问题。人的思想因一定的条件发生变化，这是事物发展的必然归宿。但具体到某个人，其思想转变究竟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样的方式发生，却有着多种多样的可能性，这就要看具体碰到什么样的偶然性。所以作家要表现人物的思想转变，还需要把这种转变的必然性通过偶然的形式表现出来，这就要善于捕捉人物转变的契机。契机一经抓住，它

便对人物的思想转变起到催化的作用，使转变顿时发生，人的思想出现新的面貌。就《水浒传》中林冲的转变来说，其契机的构思和运用便是十分精当的。一场大雪，压倒了草厅，林冲只得去古庙那里宿一夜。正在吃酒时，忽见草料场火起。林冲正待开门来救火，却听得陆谦等人在门外说话。他们洋洋得意，说要拾一块林冲的骨头回去，让太尉衙内知道他们会办事。林冲句句听在耳里。他忍无可忍，于是掇开靠门的石头，大喝一声，先把差拨、富安搦倒，而后把陆谦丢翻，用脚踏住，剜了他的心肝。事物被推到极端，就要向相反的方面转化。林冲被一逼再逼，最后火烧草料场，高俅等截断了他的后路，他在退则无路、斗或可保的绝境中，才发出了反抗的怒吼。如果说林冲的被“逼上梁山”是必然的，那么，促使林冲转变的契机则是偶然的，陆谦等人火烧草料场后在古庙门外对话，恰好被林冲在门内听见。这一契机是林冲转变的出发点，也是使林冲的性格迸发出火花的重要一笔。

总之，契机在文学创作中有着特殊的作用。它加速或延缓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和人物性格的变化。常言说：“无巧不成书”。巧，是文学创作中带有规律性的普遍现象，而契机，就是这巧中之机关。机关拨动，矛盾触发，情节出现新的转机，整个“戏”也就点活了。因此，有经验的作家都非常注重契机的构思和运用。

他们有的善于捕捉机遇，采用偶然事件为契

机。由于生活中是充满着偶然机遇的，而偶然性又可以加速或延缓必然性，这就为作家把握情节进展的幅度和节奏创造了条件，使他们有可能利用偶然性契机的导入，使故事曲折起伏，跌宕有致。《红楼梦》中傻大姐误拾绣春囊而导致抄检大观园是这样，《胭脂》中“为因一线缠萦，致使群魔交至”也是这样。胭脂在路上偶见一男子鄂生，由于邻居王氏“戏言”作媒，竟一厢情愿，种下了爱情种子。但谁能想到，因这一次“偶见”和一句“戏言”，竟闹成人命关天的惨案。先是王氏与相好宿介苟合时，“因述女言（指胭脂托媒）为笑，戏嘱致意鄂生”。不料这“戏嘱”竟使宿介滋生得陇望蜀之心，夜晚逾墙而入胭脂家，冒充鄂生求欢，遭拒后又强脱胭脂一只绣履而去。宿介不慎将绣履失落，又引出街痞毛大张冠李戴。毛大夜入王宅，本欲调戏王氏，但却捡到一只绣履，并隔窗听得宿介与王氏所述去胭脂家的经过，于是以为有机可乘，越墙去胭脂家。但他找错了门，“误诣翁舍”，最后杀翁弃履而逃。一次偶见，一句“戏言”，这在日常生活中是多么简单平常，但蒲松龄却以此为契机，作线头，牵连开去，组织起跌宕起伏的情节，涌出曲曲折折的波澜，令人目不暇收，眼花缭乱。从而显示了充足的艺术功力。

有的作家则善于选用典型的细节来构成情节发展的契机。文学作品中的情节不仅是由一系列的细节组成的，而是整个故事情节的成立与否，以及它